

性 / 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专号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美女与野兽：性与暴力

Lynne Segal 原著

金宜蓁、张玉芬、涂懿美合译，何春蕤校订

我发觉我们不断的将男性情欲当成中心议题，不断的谈它以何种形式及功能来进行社会对女性的控制。

Lal Coveney et al, 父权研究团体¹

若要严肃的将「所有男人」视为一个政治范畴，那么他们实际上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阴茎。这也就是说，雄性的生物事实之所以串联上权力的社会事实，并非透过什么历史分析，而只是定义如此而已。但在反方面，雌性这个生物事实却是框架女性经验的主要方式。

R.W. Connell²

过去大家以为年轻的知识女性都会同意，性愉悦——不管以何种方式达成——都是没有问题的欲望；然而只有到了现在，从一个不同的女性主义情欲辩论时空回首前尘，大家才觉得那个显然一致的看法有点奇怪。

Cora Kaplan³

70年代晚期之所以愈来愈强调女性与男性的经验有别，最主要是因

¹ Lal Coveney et al, *The Sexuality Papers*, p. 9, London, Hutchinson, 1984.

² R. W. Connell, 'Theorising Gender', *Sociology* vol. 19 no. 2, (1985), p. 265.

³ Cora Kaplan, 'Wild Nights' in *Formations of Pleasure*, p. 3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为对「性」(sexuality)有了一个重新的分析，而当时将「性」定义为「男性力量最主要的社会场域」⁴，后来也深远的、悲惨的影响了女性主义对异性恋、女同性恋主义、以及挑战男女权力关系之可能性的分析。我之所以认为这个定义的影响很悲惨，是因为它鼓励「所有女人」自我认同为「所有男人」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它拒绝努力尝试检视我们作为女人和男人的经验中存在着的许多复杂与混乱；这个定义同时也低估了在女性作为女人的经验中，存在着许多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它压制了早期女性主义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女人的集体力量可以协助转变所有的宰制实践——包括性方面的宰制在内。

性议题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大的，而当「性」的定义是令人费解、暧昧不明、模糊晦涩时，吸引力就更大了。倒底性最主要表达的，是不是人们需要沟通、需要关系、需要激情和动情的状态、需要展现蛰伏已久的欲望、或是需要追求或梦想那种终极的肉体愉悦？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情感、支持、沟通、了解等正面需求，或是空虚、无力、敌意、忽视等负面情绪，都很容易和性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正因为有太多的人类欲望被凝聚在性上面，我们的思绪几乎总会回到性上面来。

性被视为我们生活的核心；它几乎定义了我们每个人。20 世纪初的性学家 Havelock Ellis 就说：「『一个人，就是他的性』，这句格言的确有几分道理。」⁵ Michel Foucault 则认为，从 18 世纪初开始，「性」就被当成我们生命的「真相」；⁶ 但是他也认为这个「真相」是由社会在历史中建构出来的。我认为傅柯说得对：作为所有描述身体的论述的产物，「性」本身只是一个虚幻的整体。正是由于「性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再加上围绕这个主题的无穷尽讨论，才使得「性」成为我们生命中如此

⁴ Catherine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Signs* vol. 7 no. 3, Spring 1982, p. 516.

⁵ Havelock Ellis, quoted in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 6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⁶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1979.

强大的力量。不管它挑起的是恐惧、危险、痛苦的绝望、无穷的渴望、是对新愉悦的追寻、或是熟悉事物的安慰——性的讨论都有巨大的能力来威胁我们的平静。

我们把性当成生命中最「自然」、最隐私的部分。但是文化影像的力量定义着性，而各种法律、医学、福利措施也管理着性；这就是说，我们的性生活总是被我们的社会微妙而复杂的塑造着。而由于性是被社会所定义、所控制的，它当然毫无疑问的也串连着所有肯定男人有权操控女人的社会实践及制度。

因此，女性主义运动会因性议题而激烈的分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连 20 世纪初第一波有组织的女性主义运动都曾出现过分裂。从过去到现在的女性主义者都一直认为：女人确实共同意识到男性权力掌控了女人的性，而性确实是女男最大的区别所在。在最亲密的最后分析中，难道性不正是男人对女人社会控制的坚固基石吗？

虽然方式大不相同，然而大多数社会都有一大套法律、社会、意识型态的规则和限制，来管束女性情欲的各个层面。从捏屁股到强迫性行为，男人在世界上的强大权力常常是透过性接触的中介，或者直接透过性接触来表现的；这个权力也是被色情中无休的、无法逃避的意识型态以及图像来展现并颂扬的。那搜寻的凝视、那强压的双唇、那强有力的拥抱、而最终那强劲坚硬穿刺而入的阴茎——永远勃起、永远活跃——这些正是女人与男人面对「男性」情欲时不可避免的语言和想像。与此尖锐相对的是，女体则被建构成姿态撩人但是消极被动，被用来促销从 BMW 到排水管等等各种产品，永远被幻想，永远被消费。毕竟，西方世界的生活真相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真相；这个市场将性收为己用，以创造并激发新的「需求」和欲望。过去十年，由于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改革力量的冲击，女体有了新的再现，例如在流行明星玛丹娜的形象中同时出现了对性了然于胸的处女与妓女，受害者与侵略者⁷，然而商业剥削的主要性对象依然是女性的身体。看起来男性情欲、女性情欲的传统

⁷ Judith Williamson, 'Packaging the Punch', *Women's Review* 1, 1985, p. 4.

形象似乎没办法不和「男性掌控主导世界」这个事实有某种关连。

但是情欲形象是如何塑造成功的？这个情欲形象与男性宰制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有着强大、无与伦比的本能，在性方面既侵略也主动？或者（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行为并不是完全由生物本能所决定）它只是一种对权力的需求，而且是一个局限于男性的需求？男人可不可能一方面有意识而且任意的用性暴力的威胁来控制女人，另一方面却同时用长年宣传的异性恋性愉悦来掩盖他们那种渴求控制女人的欲望？当今许多女性主义者似乎都同意「女同性恋反色情刊物团体」(Lesbians Against Pornography Group)所说的：「女人对阴茎的性『欲望』，是被男性宰制的文化所强加的」；⁸ 而 Adrienne Rich 则说得更抒情也更有说服力：「对女人而言，异性恋根本不是性『偏好』，它是个被组合、被操控、被组织、被宣传、被以暴力延续的东西」。⁹ 男人的体力的确比女人强壮，但是像男性「性器官」那样脆弱易伤的装备（大家都知道用手轻拧一下男人的睾丸，或者用膝盖撞一下他的鼠蹊，绝对会让他痛得尖叫）是如何被转化成一个潜在的武器、一个主宰并操控的工具，而且还是男性权力的根本基础呢？男人到底如何利用性来控制女人？我觉得，答案恐怕不那么明显。

「性解放」之路

至少在表面上，女人的情欲经验在这个世纪里有了戏剧性的转变；然而，从女性主义的不满看来，愈变得多，也就是愈没改变。本世纪初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急迫中心课题之一，就是改变男人和女人间的性关系。当时 Christabel Pankhurst 在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同时就呼吁男人在性上要纯洁，也就是说，她要男人也遵行维多利亚时期对中产阶级女性所要求的性纯洁和灵性状态；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即使不是全部也大多

⁸ Lesbians Against Pornography, 'A Blow Job for Men is a Con Job for Women', *City Limits*, March 16-22(1984), p. 7.

⁹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Signs*, vol. 5, no. 4, 1980, p. 191.

数都支持她。20 世纪初期一小群女性主义性激进派，例如年轻而热情充沛的 Rebecca West 和《自由女性》(*The Freewoman*)的编辑们，她们确实曾经寻求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情欲自由，也拒绝了有关男女的传统刻板形象¹⁰，不过绝大多数妇女投票权运动者都依然强调女人的「非性欲」(asexuality)以及道德优越。如同女性主义历史学家 Catherine Hall 所说的，这也正反映出 19 世纪中产阶级女性的群相：「女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自身恪守道德标准，并且拯救男人不要陷入不道德」。¹¹

那个年代之所以呼求性的纯洁其实并不令人讶异，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已婚女人提供了最好的保障，帮助她们避开不断怀孕所带来的身体虚弱，也避开性病的感染。在另一方面，这个呼求也可以帮助女人避开未婚怀孕，避开落入那与维多利亚时期「道德的家庭」、「完美的妻子」相反的命运——也就是避开因着社会污名和经济困境而被迫坠入风尘。女性被迫怀孕、儿童身上的梅毒以及其他遗传性疾病等等都是男性性欲残害女性的明证。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观宣告的，性就是「罪恶」。

今日相较之下，怀孕和感染性病的身体危险在女人与男人性交的经验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可避免的罪恶后果」，不过还是有些人想要惩罚女人的婚外性行为，想要惩罚所有不合正统的性行为。那些人反对青少年性教育，也尝试阻挠大众认识性实践的多样性，并以此来煽动大家对性的无知与恐惧。1980 年代兴起了一阵更保守的风气，认为性应该被局限在传统男性主导的威权家庭之内；而医学界迟迟没有对 AIDS 这种在英国主要经由男同性恋性行为传染的疾病提出疗法或建议，也可以算是上述惩罚非正统性行为的退步措施的一部份。妇女罹患子宫颈癌的比率持续增加，也给了性保守派很多火力，而现代的避孕方式仍然不够安全（不管是否会危害女性健康或者降低女性的自发性欲，大家还是认为避孕是女人的责任），这也就是说，异性性行为——特别对于年轻、较没有性经验的女性来说——还是有其身体的危险。然而，虽然 1980

¹⁰ 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p. 291, London, Virago, 1985.

¹¹ Catherine Hall, *Adultery*, Programme for Channel 4 TV, 29 November 1985.

年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分贝的道德右派，20 世纪的主流趋势还是倾向截断性愉悦和怀孕之间的关联、截断性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平行的来说，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反动力量，但时代的走向却坚持翻转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情欲和对性的一般态度。对当代西方都会而言，性不再是「罪恶」。

20 世纪西方的性改革运动，以及婚姻谘询书籍和实践的稳定成长，都是以婚内男女性满足的愉悦（或说必要性）为出发点；追求的是不必恐惧怀孕的性活动。女人的性满足被视为对男性能力、技术、甚至在必要时的高度技巧展现所做出的独特回应；这样的性活动当然不被视为自发或自主的，但是它却是真正婚姻和谐或「婚姻幸福」的最重要元素——至少 1920 年代 Marie Stopes, Van de Velde 等人的作品中是这么说的¹²。这种态度不幸带来了很有压迫性的后果，使得大家愈来愈轻蔑未婚女性及其需求，并且认为「性冷感」的女人需要「治疗」。而愈是公开鼓励女人在婚姻内享有性愉悦，也就愈显示这个愉悦有可能溢出婚姻的框架，而进入婚前或婚外的性邂逅。控管女人情欲的闸门已经被削弱，汲汲而危了。

不过，即使那些支持性改革的人也有点恐惧女性情欲，担心男性的地位会因而下降。像 D. H. Lawrence 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对查泰莱夫人之类能够情欲独立的女人感到焦虑，担心她们会失去温柔、顺从等等「女性特质」。一直要到 1960 年代，大众才能接受女人婚外性行为。经济较为稳定的 1960 年代新近风行平等主义和性开放风气，也因此带来了一连串新的性改革，女人的生命随之改变；1960 年代末期通过堕胎改革法案，再加上 16 岁以上的女性即可购买口服避孕丸，这些因素都使得女人与男人进行性行为时的风险小了许多。直到今日，虽然避孕器材的取得仍然有重大的地域差异，「避孕丸」的副作用也令人担心，但是各种避孕方式的确保障了女性的性安全。

正是因为 1960 年代的「性解放」和学生抗议运动两者结合，才提

¹² Beatrix Campbell, 'Feminist Sexual Politics', *Feminist Review* 5, 1980.

供了种子让女性解放运动的花朵绽放于 1960 年代末期，然而这个新生的运动一方面肯定了，另一方面却拒绝了，那些促使自身诞生的力量。1960 年代晚期和 1970 年代早期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杰出年轻女性，绝大多数都有反帝国主义、反威权、以及在 1967 至 1972 年之间全盛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背景¹³，而性解放正是这种政治的基础：因为就反文化的意识型态而言，资本主义需要性压抑的主体，以便实现它否定生命、永续压榨、和毁灭性的目标。资本主义需要的是自我克制和工作狂，而这两者都和任何解放的或自发的情欲展现背道而驰。

回忆 1960 年代

由于肯定 1960 年代的性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在 1970 年代早期就开始认真寻求性愉悦。我们虽然没有像性学家 Masters 和 Johnson 那样仔细地纪录并指导女性高潮之道，可是他们对阴蒂的尊重，以及对男性大部分惯常性实践的严厉指责，都使我们印象深刻。如果女人并未从和男性的性经验中得到愉悦、并未享受应该属于她们的高潮，那么她们当然就比较容易驳斥男人的推诿；男人总是说问题出在女人，而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无法跟男人讨论的。因此当时的女性主义者很快就开始建议女人需要探索并表达自己真正的性心情、性需要、以及性欲望，并且开始积极的再教育和自己有性关系的男人。那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性满足可以让女人对自己更有信心，对世界更有掌握的力量——这个信念是直接来自性解放大师 Wilhelm Reich 的思想中取用的，1960 年代 Reich 的《高潮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一出英文版就成了畅销书。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女性主义者改写了女性在 1960 年代性激进风潮中的事迹。很奇怪的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现在都同样接受一个新的主流说法，她们都认为当年女人其实只有短暂的参与 Beatrix Campbell 称为「男人的性喧嚣」(men's clamour for sex)的潮流：也就是说，女人

¹³ Lynne Segal, "Smash the Family"? Recalling the Sixties' in (ed.) L. Segal,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the Famil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很快就觉得幻灭失望了¹⁴。不过我自身的经验并非如此，记录那个年代的女写手们的经验也并非如此；一如往常，事情的真相总是暧昧难明的。我们不但有 Germaine Greer 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勇敢的炫耀她自己的掠夺激情和肉体征战，并批评其他女人无法和她一样「拥抱」阴茎，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品也都写出了当时女人热烈的情欲¹⁵。纽约女性主义者作家 Ellen Willis 回想她在 1968 年写 Bob Dylan 时，也提到自己是多么地认同男性杂交式的性探险，也分享他们对占有欲的抗拒：「我了解男人想要游荡的需求，因为精神上说来，我自己也在游荡；至少我在幻想中是这样的，而实际生活中就比较难说了。」¹⁶ 她的同志 Deirdre English 也谈到当时暧昧不明的状况：「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但女人们事实上在享受许多不同的性经验，而且还乐在其中。」¹⁷

我自己以及大部分女性朋友 1960 年代的经验是，我们都很享受能够自在地和男人发展性关系，而且也很享受不时在此主要关系之外有所发展。我当时参加雪梨的解放组织「PUSH」，在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的澳洲雪梨，PUSH 是个激进的波西米亚式社会政治运动，规模不大但很有影响力，成员都是热情、反威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抱持着「随性爱欲」和「永远抗议」的信仰。1982 年有些曾经参与 PUSH 的女性还为澳洲广播委员会记录她们当年的经验¹⁸：Judy Smith 回忆 1950 年代早期的情况时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抗争就是拆毁情欲的疆界，其他的抗争是次要的。」她接着补充说：「我很喜欢当时的投入，因为大部份社会所提供的其他选择都很可怕，如果我们不推动 PUSH，就得接受都市郊区式的中产严谨生活。」Rosanne Bonney 回想她在 1960 年代早期参与 PUSH 的情形时也说：「我不同意当时女性主义流行的观点，她们总是说男人如何压迫我……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在和男人的关系中受

¹⁴ Beatrix Campbell, 1980, op. cit.

¹⁵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70.

¹⁶ Ellen Willis,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p. 1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¹⁷ Deirdre English, 'Talking Sex - Communications on Sexuality and Feminism', *Socialist Review* 58, July - August 1981, p. 45.

¹⁸ Tape of programme of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1982 (personal possession).

益匪浅。」那些受访女性共通的想法是，她们很乐意为自己负责，也很乐意为此种责任所包含的情欲自由和智识自由负责。

我现在会补充说：一旦女人决定要有孩子，一旦女人发现有关个人责任的哲学和个人愉悦的追求终究缺乏社会支撑的时候，事情就没那么好玩了。然而除了感怀好景不再之外，回顾 1960 年代很少独睡、总是和我当下最钟爱的男人共枕的时光时，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现在想来或许有点怪，不过当时情欲活动的发动者可不一定是男人；强迫式的性活动绝不是这一小撮性激进份子的经验（虽然澳洲女人经常被形容为「西方世界的踏脚垫」）。就像 Mary Ingham¹⁹ 回顾英国的情况一样，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性征战（这是我们认知这些经验的方式）之所以那么令人满足，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什么身体上的愉悦（勾引自己的教授通常是最无聊的经验，而且最好不要有第二次），而是因为这些征服所赋予我们的社会地位。不过，的确也有些女人在那个年代开始在性方面比较放松而且比较有自信；许多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当时追求新奇性经验的欲望顶撞到男人未经检验的双重标准——特别是男人面对自己的性嫉妒时的无力处理——才使得女人投入女性解放。²⁰

从许多女性对 1960 年代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至少有些女人的确蛮享受和男人发展性关系；另外还有许多女人虽然无法谈论她们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时感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可是她们对性关系的享受是爱恨交织的；当然，还有一些女人在和男人的性邂逅过程中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满足的感觉。后来，当人们对异性恋情欲模式的矛盾情结深化时，当指责女人不该享受和男人性交的趋势强化时，这些差异都会注入女人之间的冲突。然而，不管和男人在一起的性愉悦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1970 年代初期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一致拒斥——而且是愤怒地拒斥——在「性解放」旗帜之下推动的其他各种实践。

¹⁹ Mary Ingham, *Now We are Thirty*, p. 177, London, Methuen, 1981.

²⁰ 我所访谈的每位女性主义者都全心拥抱这个观察

1960年代末期出现了比较强硬的、侵略式的男性激进思想，它（至少在表面上）取代了早年比较柔性的关注。许多女性主义者很快就起而终止那些占据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地下出版社的色情刊物，这些软核（soft core）色情刊物都是男性中心的，以取悦阴茎为主，内容则不外乎奶子、屁股、群炮、和阳刚的逞强。我们揭露这些色情刊物，说它们是男人轻蔑而带有攻击性的物化女性的表现。1968年Sheila Rowbotham在激进社会主义杂志《黑侏儒》（*Black Dwarf*）的办公室里，气得在桌前贴了这首诗：「让我们把月历女郎的照片放上《黑侏儒》／让我们以自慰革命……让我们将私处紧黏／于我们投射的自我上／称此为同志之谊／以及剥削的终结……」。²¹而其他的地下杂志，如《魔法师》（*Oz*），与其说是削弱社会普遍对女性的压迫，不如说是以一些迂回的做法来强化这种压迫。年轻女性（越年轻越好）总被描述成男性的性服务者，然而，她们却被要求要和男人一样把干炮当成自身的解放。有小孩的女人可能一方面被尊称为地母，另一方面却不能对男人提出任何经济上的要求，更不必说家事上的轮替了。一般而言，女人被视为提供男人情感的慰藉和支柱，但是却无法从男人那里得到任何承诺或安全感。这对女人来说，是一个愚人游戏，就像美国歌手Janis Joplin在她那种自我鞭笞、啜泣、悸动、嘶声哀泣中所警告我们的。

当Robin Morgan在1970年毅然决然的告别激进男性的性无知及性倨傲，并且和其他女人一齐接管纽约地下报纸《野鼠》（*RAT*）时，那股风潮冷却了许多老叛将的阳具信心，却燃起许多新一代女性主义者集体的热情。到了1971年底，伦敦诸多地下出版社的女将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在六个月内生产了《多余的肋骨》（*Spare Rib*）杂志。女人决意重新争回女性情欲——至少当时看起来如此。

²¹ Sheila Rowbotham,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defined by some Socialist Men' (1968), in (ed.) L. Mohin, *One Foot on the Mountain*, p. 210,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79.

女性解放与寻求性愉悦

当时女性主义者认为，和性有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性是「男性定义的」。连我们对性行为本身的概念在字面上都是阴茎插入阴道的那一刻。不过，Anne Koedt 和一群宣导单张的作者们很快就提出宣称，认为这可能是——但也很可能不是——女性性兴奋的来源。Koedt 指出，其实女人「性愉悦的核心」是阴核，而非阴道。她说：

我们必须开始要求，如果那些被定义为「标准」的性姿势并不能帮助双方都达到高潮的话，它们就不该再被视为标准。我们必须开始尝试或发明新的技巧来改变目前性探索的这个特殊层面。²²

大家觉得女性一直被囚禁在对自己的性一无所知的黑暗中，因此她们也无法肯定自己的性需求，而性（或者干炮）的语言总是把行动和控制规划给男性，把被动和臣服规划给女性。因此，性的语言就象征了世上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最纯粹的性歧视图像：宰制的男人，屈从的女人。Pat Whiting 在 1972 年写道，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就「在『重新制约』男人，解除加诸女性身上的双重标准，为女性的情欲建立一个比男性社会所提供的更为真实的形象。」²³

重新评估女性性愉悦的来源，并拒绝那种颂扬男性性自主但贬抑否定女性性自主的双重性标准——这正是 1970 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对标准异性性实践的批判核心。和这个批判相连的还有一个 1960 年代以来建立的信念，就是认为性压抑与社会无力感相关。1972 年 12 月妇女解放工作坊出版的报纸《悍妇》*Shrew* 刊出了粗体的大标题：**被压抑的女性性欲力量**。文章是这么开始的：

女人拥有比男性更多的性能力。但是数千年的父权制约剥夺

²² Anne Koedt, '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 in (ed.) L. Tanner, *Voices from Women's Liberation*, p. 159, New York, Mentor, 1970.

²³ Pat Whiting, 'Female Sexuality: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d.) M. Wandor, *The Body Politic*, p. 189, London, Stage One, 1972.

了我们的性潜能，并且欺骗了我们对本身性欲真相的了解。

文章结尾说：

女人一旦直接经验到她自己强而有力的性能力，就再也不能容忍被说成天性被动、本质上悦虐、而且只有在屈从于男人时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对这个女人而言，这些说法都是荒谬的……当她终于了解到自身力量的现实时，女人永远不会再放弃这种力量。²⁴

或者，如同 Beatrix Campbell 在次年发表的论点：

女人在性上的被动及物化，削弱了她们的自主个体的运作……承认肉欲、接受所谓的性开放，都是女人逃离性顺从所必经的阶段。

她的结论就更乐观了：

在决定性是如何表达的时候，女性的介入并不一定要止于发展出「新的反应模式」而已，因为这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女性在性领域中的介入，其真正的力量在于有可能会彻底剔除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这整套迷思。²⁵

《悍妇》杂志发行性专题时也附带了一个圣诞节特别赠礼：「屌：给淫乱女人的杂志」，其中刊载了巨大的男性裸体、RAM 假阳具、和 RAPIER 刮胡刀片，以此嘲讽普遍的男性性幻想。可惜的是，这种自信的嘲讽语气却很快的就从女性主义书写中全然消失了——取代它的是纯粹的愤怒。这类对男性性偏执的嘲笑也出现在《多余的肋骨》早期的杂志中。

1970 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在性分析上呈现的第二个层面强调，女性在历史过程中从来就无法控制她们自己的生育权；这也使得女人在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时有着潜在的危险和问题，并且使得男人有权力控制女人。

²⁴ Angela Hamblin, 'The Suppressed Power of Female Sexuality', *Shrew: Women's Liberation Workshop Paper*, vol. 4, no. 6, December 1972, p. 10.

²⁵ Beatrix Campbell, 'Sexuality and Submission', in S. Allen et al, *Conditions of Illusion*, p. 108, Leeds, Feminist Books, 1974.

与男人主导定义性观念的程度相较，那些和生育及育儿相关的概念及安排都更为根本的把女人的生育——最终则是女人的生命——都置于男人的手里。

除非在婚姻和家庭之内，女人根本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来选择生下小孩，而这个婚姻家庭却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层面上，都建构了男人得以凌驾女人的力量和权威。同样的，在性上面活跃主动的女人也没有权力自信的、安全的**不生**小孩；因为自有历史以来，女人就一直无法享受适当的避孕设施，假如碰巧怀孕的话，就会被（男性的权威者）否决她们有权利享受人道的或毫无困难就可以获得的堕胎设施。这样的分析使得免费的避孕以及自主决定的堕胎成为妇女解放运动早期的主要议题，那是女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底线。Rosalind Delmar 在 1972 年写道：「现在，免费的避孕以及自主决定的堕胎已经是每个妇女运动的重要诉求。」²⁶ 在这充满希望的早期年代中，女性主义者在情欲、生育、和育儿议题上的所有文宣诉求似乎都向女人应许了一个崭新的未来。Monica Sjojo 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总结：

女人控制自己的生育，这质疑了以父为中心的家庭功能，也质疑了女人过去在其中被当做无偿劳动力的来源——最终则质疑了我们居住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²⁷

虽然女人的免费避孕及堕胎权可能是早期妇运的最佳象征——这个诉求也得到很多左派男人和职业工会的支持——但是这个诉求也总是和一些更广泛的议题连在一起的，其中包括妇女健康、性、生育、及育儿。1970 年代中期英国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妇女中心，其中最活跃的组织就是妇女健康团体，它们不但推动妇女自我检查和自立自助，后来也揭发了产科和妇科为女人提供不当照顾的可怕黑幕。这些妇女健康团体领导妇女抗议她们被剥夺主动掌控整个生育过程的权利，所以也经常在大部分男性、医生之类的权威者手中经历贬抑和羞辱。大体而言，健康照顾被视

²⁶ Rosalind Delmar, 'What is Feminism?' in *The Body Politic*, op. cit., p. 118.

²⁷ Monica Sjojo, 'A Woman's Right over Her Body' in *The Body Politic*, ibid., p. 181.

为一个关键的政治议题；这些妇女健康团体的出现，预示了现阶段广受关注的整体健康观念，促成了针灸、自然病理学、健身课程的成立，这些也都强调生理、心理、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关连。由于它们强调自立自助和另类医疗，因此这些努力有很大一部份必须牵涉到同时在国家卫生组织机构内外施力。

妇女健康团体也鼓励并为青少年发展更好的学校性教育，她们强调妇女需要更积极、更独立的女性情欲形象。女性主义者忙着找寻更多知识以理解并控制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为育儿争取更好的社会设施及社会福利；当然，她们也要求男人更多参与育儿和家务。「女人的选择权」是创始于 1975 年的「全国堕胎行动」(NAC) 组织的口号，但是它所代表的，是远远超过合法堕胎议题的。

到了 1970 年代中期，英美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t)理论都十分坚决的认定社会对生养小孩的安排措施事实上为男人掌控女人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再生产被视为女人的主要责任，而且由家庭这个「私」领域来组织，这使得妇女被隔绝在外，而无法在公领域的生产活动及市场控制中担任核心职位或重要角色。公、私领域的分隔以及相应产生的意识形态，在在构成了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要依赖男人。男人就这样控制了女人的性和家务劳动；这些方面也就是男人掌控女人的关键。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不仅被供奉为男人在婚姻中享受的权利，而且（大部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总是不遗余力的强调这个观点）还透过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观念及经验来强化这样的权力关系：男女各有归属的领域、特有的能力、截然相反的欲望和情感。在这个理论架构之内，人们对男女情欲所抱持的观念被视为只是那个更广泛的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特殊面向；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因而强调需要去分析并打击现存之意识形态，后来更逐渐转变为强调无意识在支撑意识形态及决定行为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找出一个理论架构来理解男人在物质世界及主流意识形态中如何控制女性情欲，是一回事；提供一个更细致、更精确的理论以理解

并解释人类的性关系，是另一回事；对我们运动实践中的人来说，个人面对性时如何和各种疑虑、两难、困局搏斗，就更是另一件事了。

我们的问题并不那么直接和理论相关。对大多数异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反而是我们和男人建立性关系时所体验到的希望、恐惧和怨恨；当然，也是在这一点上，激进女性主义对情欲的分析批判有了它直接的、可见的吸引力。就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所有的关系总是被男人集体努力确认并维持掌控女人的权力所决定；这就是父权的本质——所有社会中最原初、最基本的权力关系。在 **Kate Millett** 和 **Shulamith Firestone** 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书写中，男性性欲主要以征服女人为目标，其中则牵涉了剥削和宰制。**Firestone** 写着：「的确，爱情的意义对男人和女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爱情对男人来说就是拥有和控制……」²⁸ **Kate Millett** 认为父权的本质就是阳具权力，最清楚的展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性剥削上，她描绘在小说家 **Henry Miller**、**D.H. Lawrence**、以及 **Norman Mailer** 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她所谓「性的食人族」(sexual cannibalism)，认为那是父权现实的真实「文学反映」。²⁹ 这些男性作者暴露出男人为女人的设计都是虐待的、恶待的、掌控的、和宰制的。

这里所呈现的激进女性主义理念非常有说服力，因为这些名作家在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暴力和虐待式性幻想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即使别的女性主义者后来指出，类似《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很清楚是否恶待女人，但是其他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学经典倒是非常清楚的恶待女人。³⁰ 激进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性欲的「揭露」，其实和「常识」中对性的假设相去不远：性是攻击的，也是男性的。**Roger Scruton** 写到「无法控制的阳具雄心」³¹ 或者 **Enoch Powell** 引用《圣经》

²⁸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s of Sex*, p. 138, London, Paladin, 1971.

²⁹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London, Abacus/Sphere, 1972.

³⁰ Cora Kaplan, 'Radical Feminism and Literature: Rethinking Millett's Sexual Politics', *Red Letters* 9, 1979.

³¹ Roger Scruton, *The Observer*, 22 May 1983.

创世纪中说「男人心中的想像自小就是邪恶的」³²，他们都表达了相似的想法。这个常识既创造、也反映了它所描述的现实。

后来使得女性主义者由震惊转向愤怒，最后终于无助绝望的，是大家（特别是有权位的男人）最初公开否认而后更持续容忍男性向女性施展暴力。这种对现实的视而不见，竟然很讽刺的具体呈现于 Germaine Greer 早期的书写中，她的作品完美的压缩呈现了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性激进份子——对男性暴力问题的漫不经心态度。她在作品里说：

男人的确用暴力威胁——通常是很戏剧性的——使得唠叨不休的妻子安静下来：但是这种暴力几乎都是假装的。它事实上只是一个精神游戏，很容易就可以抛开了。³³

要不是因为这些说法之中不免有些知识关乎男人对女人行使性暴力的真相，而且也与「终究要怪女人」的迷思相吻合，这种天真的论调本身或许才是该被丢弃的，它在认知上的失败来自太过专意于推广对性的正面态度。Greer 还告诉我们：「女人在酒吧和舞厅中总会带来暴力的场景」³⁴，「男人向女人所做的邪恶残忍举动，大部分都是因为女人的挑衅」³⁵，「假如女人能够提供一种真正另类的方法来解决暴力的问题，世界就会少点儿痛苦。」³⁶ 在这些即使今日最坚定的性别歧视者看来也有点怪的言论中，Greer 反映的只是 1970 年代早期大部分人流行的想法罢了。例如心理治疗师 Anthony Storr 广受欢迎的智慧之言就提醒世人：「唠叨而富攻击性的妇女经常是在无意识中要求她最害怕的东西——男人在性上的宰制和攻击。」³⁷ 但是在企图松动这个特殊的「常识」神话时，女性主义者发现根本愈来愈难坚持任何进步的性政治立场。

³² Enoch Powell, *The Guardian*, 12 August 1985.

³³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op. cit., p. 316.

³⁴ *ibid.*, p.316.

³⁵ *ibid.*, p.260.

³⁶ *ibid.*, p.317.

³⁷ Anthony Storr, *Human Aggression*, p. 177,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面对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性暴力

19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者被迫面对的首要议题就是男人对女人和小孩行使的家庭暴力。1971年 Chiswick Women's Centre 刚刚成立，当一群受暴妇女登门寻求协助和保护时，第一个「妇女救援」(Women's Aid)之家在没有什么审慎的计画下成立。后来的几年内，许许多多女性主义民间团体持续协助建立或支持类似的避难场所以帮助妇女逃离暴力的男人；这些避难所的经营方式都是民主而集体的，以保证所有妇女在此都能拥有最大的自主权和参与度。1975年，35个类似的团体组成了「国家妇女救援联盟」(National Women's Aid Federation)，目的在提供暂时的避难所给所有受暴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也企图将愈来愈多有关家庭暴力严重程度事实公诸于众：在所有的暴力犯罪中有25%是妻子受暴³⁸。「妇女救援」组织也努力推动修改法律、修改国民住宅的设施、修改社会政策以保护并资助受暴妇女。「妇女救援」组织中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妇女之所以很难逃离家庭，是源自整体社会对女人的宰制，以及已婚妇女（尤其是有了小孩的已婚妇女）特别承受的、在经济和法律上的依赖状态。特别要强调的是，女人在家庭内对男人的依赖地位，是透过国家不完善的儿童福利政策和缺乏育儿设施来形成而且持续的；妇女工作所得的低薪也是这个依赖状态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女人是多么深陷于经济和社会的无力感之内因而削弱了自身力量，也不管有哪些男人是如何被现存的社会条件所残害，妇女在她们最需要安全和保障的空间——家庭——中遭受恶劣的残暴和持续的性虐待，这个事实女性主义阵营中激发了对男人强烈而尖锐的敌意。某些女性主义书写中开始出现战斗的语言，特别是那些协助受虐妇女的女性主义者；女人逐渐武装起来抗争男性集体制造的恐怖主义。过去存在在个人之间，一半玩笑一半严肃的两性战争，现在在一个新的、集体的、致命的基础上被重新组织。自1974年以来，英国女性主义者在受

³⁸ Angela Weir, 'Battered Women: Some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ed.) M. Mayo, *Women in the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虐妇女问题上的工作已经扩散至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各地，英国的女性主义者则开始另一项类似的工作，也就是引用美国已经累积的研究来关注与强暴相关的事项。第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Rape Crisis Centre)于1975年左右在伦敦成立，提供被强暴的受害妇女协助和谘询，该中心也致力于改变法律、警政、和医疗方面的实践，因为这些系统都掌握在男性权威的手中，而他们都相信那个传统神话，认为受到性暴力攻击的妇女大部分在某种程度上都曾挑衅男人、或曾与男人共谋、或是活该被男人施暴。女性主义者指出，这个迷思还认为有些妇女是「无辜的」，而大部分的女人是「有罪的」，她们的罪就在于她们看起来是独立而性活跃的女人。

当时女性主义者急切地想要了解强暴在我们社会中的普遍程度，想知道有关男性性需求的迷思为何能那么容易的就责备性暴力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透过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女性主义者开始认为强暴是妇女在社会中的整体屈从地位的延伸。Anna Coote 和 Tess Gill 在1975年讨论「强暴论争」时写道：

就像妇女在家庭暴力中受害一样，强暴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植根于几世纪以来男性至上的观念，以及我们社会在财产、性、和暴力三者之间建立起来的连结……除非这些鼓励暴力而且使得妇女一直处于劣势的社会条件有所改变，否则强暴的问题是无法有效解决的。³⁹

然而，这么多针对女人的残暴犯罪，以及媒体、法庭、警察、医生和其他团体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虚伪、自相矛盾的反应或轻视的厌恶，都再一次点燃女性主义者对男人的怒火。

愤怒或许比指导来得有智慧。当我们想要告诉男人，女人是如何看待他们对女人的痛苦的漠视时，愤怒很合用；可是，单单愤怒是无法了解男人和女人的情欲——变态或其他情欲——的。

³⁹ Anna Coote and Tess Gill, *The Rape Controversy*, p. 3, London,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 Pamphlet, 1975.

1975年前后，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些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和「妇女救援」以及「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相连的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性行为的某一方面，愈来愈有话要说，也就是强制(coercion)和暴力的彰显，其他的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和男人有性关系的女性主义者——则愈来愈感到无法说出她们自己的性实践和性经验。由于探索个人生活和经验仍然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而情欲仍然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关切的重心——不管是女同性恋、禁欲者、或者主要是异性恋——这样的缄默很显然表示有了问题：英国女性主义文选《破釜沈舟》(*No Turning Back*)收集了1975到1980年间的作品，其中却没有一篇是讨论异性恋的文章⁴⁰；1982年Sue Cartledge和Joanna Ryan的后续研究计画主要是想收集后来女性主义者有关情欲的书写，但是因为她们发现能收集到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最后只好放弃，转而邀请新的文章来加入她们的新书《性与爱》(*Sex and Love*)。⁴¹

Anna Coote和Beatrix Campbell在她们的妇女解放运动史《甜蜜自由》(*Sweet Freedom*)中对这样的沈默进行反省。她们认为沈默是来自「异性恋沙文主义」和「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之间令人挫折而无用的斗争，这个斗争使得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陷入僵局和失望，也无法认同任一立场⁴²。但是这两位作者对异性恋沙文主义的说法却主要倚赖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这本书虽然很有影响力，但是是女性主义兴起之前的文本，至少也只能算是非常特殊的女性主义文本，但是和当代的妇女运动没什么关系。(虽然一般人认为《女太监》无法代表早期的妇女运动，大部分妇女运动还是十分拒斥Greer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她对集体行动的排斥。)另一方面，强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情欲分析日渐壮大，而且在1978年之后非常具有影响力；在我看来，它可以说不但造成了面对异性恋情欲时的女性主义沈默，也是这种沈默的后果。

⁴⁰ *No Turning Back*,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1.

⁴¹ 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 *Sex and Lov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3.

⁴² Anna Coote and Beatrix Campbell, *Sweet Freedom*, p. 222, London, Pan Books, 1982.

性学以及女性主义对性的理论化

我认为 1970 年代晚期对异性恋情欲的沈默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解释，不只是简单的透过妇女解放运动来理解。这个沈默是因为当时能让女性主义者援用的情欲理论不足，因而在女性主义的性政治上形成弱点。1970 年代女性主义对情欲的想法，如同我暗示过的，受到近百年来「性科学」所普及的观念和研究所影响。如果回到这些观念的历史中，就更能了解很多现存的争论。

Krafft-Ebing 的古典案例研究恐怖的记录了 1880 年代在维也纳法庭前游街示众的所谓性「变态者」的不堪处境，这些案例也开创了一个研究和理论的新领域。同样在 1880 年代，英国人 Havelock Ellis 开始了一个庞大的针对所有已知多样性行为的全球调查分类，他把后来展示的人类「性偏差」视为每个个体某些核心本质的产物，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同的性欲望和性倾向。对 Krafft-Ebing 以及 Havelock Ellis 来说，性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普遍对个体和社会都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其后的性学家对这个观点也少有异议）。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对「私密生活」的重视，暗示情欲的确是理解大多数可能搅扰社会的问题的关键。家庭领域内的个人生活，因此必须和公众、理性的生产世界分开，因为它潜在威胁到这个公众生产世界的运作。同时期的达尔文理论强调人类行为有其演化的基础，性理论则相应的认为性行为是被内在的「自然本能」所驱策的，有着强大而无法控制的力量。（至少在人类的男性中看到这样的状态。）

性学的创始者们因此为性行为提供了本能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解释，将性行为——不管它有多复杂和多样——看成是某个内在生物本质的直接流露。这是我们熟悉的观念，直到今日都和常识中对性的假设如出一辙。Jeffrey Weeks 曾说，性学开始记录并分类所见的「性的真理」的时候，也促使将性提升为身分认同的中心⁴³。20 世纪的性学家后来修正了前人强调的观点，特别与 Krafft-Ebing（以及 Freud）的普遍悲观

⁴³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op. cit.

保持距离，因为后者把性冲动的潜在危机和反社会本质看得太可怕了。和前人不同的是，20 世纪的性学家反而强调性冲动对人类的好处，因为（他们相信）它可以被用来巩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过，他们仍然没有摒弃 Krafft-Ebing 和 Ellis 的生物主义或本质主义。

1940 到 1950 年间的 Alfred Kinsey 以及 1960 年代的 Masters 和 Johnson 都在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取代了早期的本能理论而成为心理学理论主流的时刻，着手开始他们自己对人类性行为的「权威」调查。这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去描述并量化那些特殊类型的物理刺激，这些刺激有效的产生出性学家可以明确标定的——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测量的——性反应的现象：也就是高潮时的生理收缩。Kinsey、Masters 和 Johnson 采用当代行为学派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在决定什么类型的刺激可以激起性欲时，「学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他们对性过程的描述，甚至比他们的前辈们还要更物质化、生理化。

「放松，轻柔的抚摸，假如妳想要高潮的话。」由 Masters 和 Johnson 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提供的性治疗课程不断蓬勃发展，成了无数其他课程的楷模，它所使用的「感觉对焦」(sensate focusing)公式，成功的准备了参与课程的伴侣们，以便学习新的性技巧，寻求更好的性体验。说真的，在 Masters 和 Johnson 宣教式的出版品中，一夫一妻异性恋伴侣关系里的美好性体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⁴⁴（美好的性生活也被当成消除所有社会罪恶的方法，因为英国和美国都认为社会犯罪出自不断攀升的离婚率。）Masters 和 Johnson 最强调的核心理念就是，女人现在必须能在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中公平的分享生理性欲的发泄——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发泄的话。高潮平等权！这是新的性治疗学派热心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经由 Kinsey 令人沮丧的调查报告以及后来许许多多研究，已经充分了解两性之间在高潮分布上的不平等看来是多么的严重和

⁴⁴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Human Sexual Respons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6;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Human Sexual Inadequ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7.

不公平！就这个观点来看，那存在于内心的野兽，也就是危险的性冲动能量本身，是可以被驯化和训练的，甚至可以培养出两性间更美好更公平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当代性学——虽然机械化而且误导人们——乐观的讯息。

女性主义者虽然很快就采用了 Masters 和 Johnson 所描绘的，女性性欲伟大的、扩张的、不断出现的高潮收缩特性，却没有被他们俩人的性交——异性恋常态——宣传所骗。Masters 和 Johnson 一向坚持，阴道中的「阳具戳刺」应该足以刺激女性高潮，因为它能同时导致阴核部位的相应动作。针对这个说法，女性主义性研究者 Shere Hite 立即提出反驳，她认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扯一扯男人的老二也应该足够刺激男人高潮。Shere Hite 在自己所作的调查《海蒂报告》(*The Hite Report*)中指出，只有 30% 的女人能固定的经由性交达到高潮，大多数女人要达到高潮还需要直接刺激阴核；⁴⁵ 这也就是说，像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所乐见的，就达到高潮的刺激而言，生理男性的存在与否并不相关：女人自己就可以轻易办到，不管是自己搞，或是两个女人互搞，或是以想要的任何其他方式达成。（当时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好像还没有注意到，生理刺激很可能和欲望的动力一点儿也没关系，因为欲望的动力主要是无意识的。即使我们曾经注意到这一点，当时的女性主义论述中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公开的」说法。）

然而，很多女性主义者还是被 Masters 和 Johnson 那种粗浅而简单的行为心理学欺骗了，因为它和当时大多数英美心理学里流行的解释相通。不只性行为被简化为生理技术和身体感受，和它们在文化、社会上的意义或在社会关系中的脉络区隔开来，而且人类的意识被化约成一连串可以受意志控制的态度。虽然 Shere Hite 的发现和 Masters 及 Johnson 不同，Hite 却和他们一样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带着「极度的愉悦」，Hite 娓娓说出她四年来对人类性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为什么女人会有高潮？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只

⁴⁵ Shere Hite, *The Hite Report*, p. 229, New York, Dell, 1976.

要有正确的刺激，迅速、愉悦、而且可靠……，高潮就会发生。整个的关键就在适当的刺激。⁴⁶

对女性主义者而言，这样的观点后来证实是个很有误导倾向的乐观自发主义。这也为 1970 年代晚期女性主义悲观的翻转大部分早期的性思潮铺了路：从强调女性的性愉悦，转而强调追求性愉悦时可能带来的危险。

在 Hite 之后，一堆自称为女性主义的教导书和文章出版了，大部分产自美国，而且被 1970 年代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狂热地阅读着。从 Betty Dodson 的《解放手淫》(*Liberating Masturbation*)、到 Lonnie Barbach 的《为你自己：女性性欲的满足》(*For Yourself: The Fulfilment of Female Sexuality*)、到 Barbara Seaman 的《自由与女性》(*Free and Female*)，就像这些书的标题所标示的，作者们不断的强调，女人可以（为了她们的心理健康和战斗的精神，就更应该）学习那种可以满足她们自己特殊「性需求」的技巧⁴⁷。书中传递的讯息总是相同的：女人可以透过对她们身体和性器官感受的探索，来发现她们「真正的需求」；一旦发现了，就可以知道如何从性中得到想要的；女人不必等待别人来满足她们的性需求，她们自己就可以做得相当好⁴⁸。一旦了解了自己独特的身体感受（要是妳在寻求认同上有困难，或许妳可以在此找到那个认同），一旦妳学会抛弃那些还残存着的对自我的过气看法（只要妳决定要抛弃它们），这些书暗示，保证妳都可以达到性满足——不管有没有性伴侣。在这里，女人的性被当成某种「内在本质」或「身体电流」，是个人和身分认同的来源；任何把性当成沟通、了解、或关系的想法都完全被压抑不见了。

在女性主义这个早期的年代中，罗曼蒂克的期待被视为危险的幻象，只是为了诱捕女人进入婚姻或者别的情感依赖关系，而任何真正的

⁴⁶ *ibid.*, p. 270.

⁴⁷ Betty Dodson, *Liberating Masturbation*, distributed by Betty Dodson, New York, Signet, 1972; Lonnie Barbach., *For Yourself: The Fulfilment of Female Sexuality*, New York, Signet, 1975; Barbara Seaman, *Free and Female*,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1972.

⁴⁸ See Lynne Segal, 'Sensual Uncertainty, or Why the Clitoris is Not Enough', *Sex and Love*, op. cit.

女性主义者都无法满足于这样的依赖状态，因为在过度高估或者理想化性伴侣时，它无可避免的会有内建的不平等。当时女性主义认为，女人只有在对本身缺乏安全感的状况下才会和男人建立罗曼蒂克依附关系。Verena Stefan 在她 1975 年的女性主义畅销书《蜕皮》(*Shedding*)中就写着：

我仍然爱着 Dave，他因为泌尿系统感染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能行房而感到抱歉。我也一样。我需要他，因为我沒有自己。〔斜体字为作者所强调〕⁴⁹

在这样的女性主义性反省中，没有任何惊叹，没有任何欲望；的确，在这种相信女性可以重新争回自己身体的盲目乐观主义中，几乎没有任何强烈的感情。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写作方式的确对很多女性主义者有解放的效果——至少有一阵子是这样的。就像 Hite 一再保证的，「掌控自己的刺激，就象征拥有自己的身体，这是通向自由非常重要的一步」，这种信念是令人倍受鼓舞的⁵⁰。Eleanor Stephens 在 1975 年《多余的肋骨》杂志中所下的结论有部份是正确的：

在妇女运动所提的所有议题中，女性主义处理女性情欲的方法对很多妇女来说，完全改变了她们对自己的感觉……对自己的性负责，这个想法的含意深入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给了女人一个自主权和力量的新意识。⁵¹

《多余的肋骨》期刊在这个时期已经不再自负的嘲讽男人对性的迷恋，而代之以描述个人生活及感受的作品，后来更以有关性技巧与如何达到高潮的作品来取代。因此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异性恋性欲已经被移出了个人人际关系的脉络，而以个人的需要是否被满足来呈现。在此同时，有关女性庇护所和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文章也愈来愈重要，这些

⁴⁹ Verena Stefan, *Shedding*, p. 20,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79.

⁵⁰ Shere Hite, op. cit., p. 386.

⁵¹ Eleanor Stephens, 'The Moon Within Your Reach', *Spare Rib*, 42, December 1975, p. 15.

文章当然就比较强调男性的暴力。⁵²

然而在妇女解放运动初期，许多女性主义者至少在某些时刻可以感觉到一股群体的力量和自主感，这种力量和自主感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绝望——至少我们愈来愈不会绝望地找寻男人来提供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满足。只要姊妹情谊继续滋长，只要它使我们感觉安心、兴奋、大受激励，只要我们以女性主义抗争来充实每分每秒的生活，我们就感受到那种自主的力量。

1973年 Robin Morgan 出版诗集《怪兽》(*Monster*)时，再度以她特有的修辞颂扬了当时某些很容易情欲化的骚动：

我想要一个属于女人的革命，就像我想要一个情人一样
 我渴望它，我好想要这种自由
 要终结所有的挣扎、恐惧、和谎言
 我们同声吐气——情愿在这个欲望的激情发声中
 死去⁵³

相较之下，Sheila Shulman 写于1974年的《给洁琪的诗》(*Poem to Jackie*)或许比较典型也没那么戏剧化，这首诗描绘了一种比较压抑但是类似的狂喜：

当我（对你）说「我的姊妹」时
 有些孩童时期的寂寞就愈合了⁵⁴

我想，就是女性主义本身这种共享的拥抱——而不是出现了什么个人的、独特的、解放的身体感受——感觉起来才像是应许了一种崭新的爱。我们当时发现的，并不是什么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真实女性情欲」，而是一种出于自己而想要爱所有女性的欲望。

⁵²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Marsha Rowe (editor for *Spare Rib* anthology).

⁵³ Robin Morgan, *Monster*, p. 84, London, private edition, 1973.

⁵⁴ Sheila Shulman, "Pome to Jackie," in (ed.) L. Mohin, *One Foot on the Mountain*, p. 214,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79.

到了 1970 年代中期，这种有关女性内在强大情欲的乐观女性主义愿景，愈来愈需要和那种因为意识到男性对女性持续施展性暴力而来的沮丧，以及那些深嵌于异性恋语言和异象中的性别歧视及恨女情结，整合在一起；而这些立场相异但是贯注于「性」的观念，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被简化成有关「性的本质是什么」的对立想法。

早期女人有极大的热忱要夺回她们「真正的性欲」，也就是表现一种「本质上很女性」(essentially female)的性欲，但是这种热忱很快的就在女性主义的写作中采用了训示的语气。1981 年 Anja Meulenbelt 在英国出版的《为我们自己》(*For Ourselves*)就是个很好的范本：在这本书的描绘中，女人的需求都是积极而进步的：女人想要在性关系中享受平等、感觉独立、并自我控制。⁵⁵ Meulenbelt 在书中复诵了当时已成为女性主义正统的说法，认为女性的性感觉大部分和性器官的插入无关，而且只有在这种性感觉的基础上，女人才可以和自己来上一段愉快的「外遇」。Meulenbelt 向我们保证，「不是只有一种解放或释放的性欲」；然而在她的说法中，通往解放的门路却非常狭窄而且困难。⁵⁶ 譬如，她观察到某些女人的确可以经由自己阴道内的动作而制造高潮（暗示：别指望别人替你制造高潮！），她接着说，「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普遍。而且即使你能做到，问题仍然是：你要这样做吗？」(Meulenbelt 强调)。⁵⁷ 这个问题饱含深意，其含意则透过书中对个别女性所做的访谈来明白的直说——访谈者质问：「你不会真的期望能从男女性交中达到高潮吧？」暗示：希望你不会！受访者因此急急忙忙的向访谈者保证：「喔，不，我也不喜欢做爱，每次都糟糕得不得了！」⁵⁸ 这样的答案还差不多！

革命女性主义连番兴起

从 1970 年代中期以降，虽然有像这样主要是自恋式的性活动(!)，

⁵⁵ Anja Meulenbelt, *For Ourselve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1.

⁵⁶ *Ibid.*, p. 8.

⁵⁷ *Ibid.*, p. 95.

⁵⁸ *Ibid.*, p. 134.

继续承诺带来性满足（确实是个有点寂寞的追寻），但是已经有一种全然凄凉的前景悄悄爬进了女性主义有关性关系的讨论中。女性情欲的愉悦和欢乐一如所料的，比许多女性主义文本所应许的来得更为难以捉摸；异性恋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都发现，她们的性关系仍旧混杂着和往常一样的愉悦、满足、挫败、矛盾、和执拗的依赖性⁵⁹。那种以为可以就此轻松的选择转化我们性经验的旧乐观主义，已然烟消云散了。

然而，那个相信女性内心有着真正的、积极的需求和欲望的信念，并没有被拒斥；那个相信女人可以透过发现自身「真实」的性欲而找到她们共同的女性情欲的信念，也没有被拒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杂志《荡妇》(*Scarlet Women*)的编辑群在1981年情欲专号的序言中重申：「所有的女人，不论是女同性恋或女异性恋，都拥有同样的情欲」；接着她们又说：「我们也认为女人和男人的性欲有着真正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许和男女不同的生殖功能有关，而这些差异又被父权所激化。」⁶⁰不过1980年代初也开始出现另一种很强的说法，它相信女性自身的情欲已经被男性强加的「强迫异性恋」搞得「残缺不全」或「全面否定」⁶¹；这股流行的「政治女同性恋」(political lesbian)或「性分离主义」(sexual separatist)意识型态，也在妇女运动中日渐壮大。然而，「政治女同性恋主义」并不是对性取向本身的正面肯定：欲望女人或与女人积极交往，并不是政治女同性恋的基本特质；相反的，它是透过拒斥异性恋来反向的定义自己，她们甚至把这种拒斥当成解决男性宰制的政治方案。（不出所料，有些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很快的就开始反对这种去性化、纯策略性的定义，因为在这样的定义下，她们的性欲似乎命定了自己必须担任道德先锋。）⁶²

在英国，这个新的女性主义情欲分析被广泛采用的转捩点，就是「伯

⁵⁹ See *Sex and Love*, op. Cit., for examples of the difficulties of both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⁶⁰ Editorial Collective, *Scarlet Woman* 13, May 1981, p. 29.

⁶¹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op. Cit.

⁶² See Wendy Clark, "The Dyke, the Feminist and the Devil," *Feminist Review* 11, 1982.

明罕全国妇女解放会议」(Birmingham 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 Conference)在 1978 年通过的提案(当时会议中的反对声浪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召开像这样的全国会议)。这项提案将「定义自身情欲的权利」("the right to define our sexuality"),明定为妇女运动中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首要诉求;男性的性宰制——它使得女性自我定义的情欲无法萌生——被正式认定为女性所受压迫的核心。这么一来,历史悠久的「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女性主义启示,被颠倒成「政治即个人」(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而且「个人即性欲」(the personal is sexual)。原来的「个人即政治」说法曾经促成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看似「个人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是法律、经济、文化、社会和情欲等方面使女人居于屈从的地位,这个觉悟因而使女性主义者得以抛弃自责与自恨。但是现在,「个人即政治」的新诠释却反倒比较被用来制造个人的罪恶感和自责,使得有些女性主义者感觉到需要因为自己涉及「不正确」的私人关系和性关系而被指责。

最明确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置放于男性性实践和异性恋「建制」中的声明,来自于几个崛起于 1970 年代晚期且影响广大的英国革命女性主义团体——讽刺的是,它们大多是由先前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组成。不过她们的想法对女性主义政治来说其实了无新意;它们只是把长久以来存在在激进女性主义中的主题放大了而已。例如, Susan Griffin 早在 1971 年就写到:「强暴的基本要素存在于所有的异性恋关系中」。⁶³ 有一篇 1979 年的论文〈政治女同性恋主义:反对异性恋要旨〉("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则概述了革命女性主义的立场。那是个简单的立场:性是问题所在,避免接触异性恋则是解决的方法。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在文中否定了阶级与种族的重要性,认为男性宰制女性的基本压迫是特别透过「性」来维持的⁶⁴。所以,「对一个女性主义者而言,放弃和男人干炮,才显示你很严肃的看待你的政治。」

⁶³ Susan Griffin, "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 *Ramparts*, September, 1971.

⁶⁴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 in *Love Your Enemy*, p. 5,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81.

65（她们后来调整了这个声明，她们说：事实上女人也不可能放弃「干炮」，她们只能放弃「被干」，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女人干男人』的说法根本是胡扯；事实上是男人在干女人，或者女人被男人干。」）66 在这里，异性恋性欲之所以被咒诅，是因为它就像原罪似的，无可避免的会使女人无力（「摧残她的信心且消耗她的力量」）而使男人有力（「使他更强大，不只是凌驾于一个女人——而是所有女人——之上」）。

本来在男性（及女性）的狂想中，阴茎被视为具有令人惊惧的全面征服力，象征了男性征服世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革命女性主义的言论中竟然被呈现为不折不扣的现实，是一股全力反扑的生活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明显的化约、这样一个对阳具的迷恋，怎么会对女性主义有那么强的把持力？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女性主义者一直就倾向认为「性」是自主的存在于人际关系脉络之外的。

革命女性主义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它不但面对诸多男人对女人施暴的现象，表达了真实的愤怒，也正确地挑战了早期女性主义挪用性学家的训示时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式自满。这些性学训示规避了男性权力和男性暴力的问题（不管是在卧室内或卧室外），而专注于建议改进男性在性上面的不佳表现，以及一种与任何特定种类的性伴侣或性关系无关、较自慰式性欲的乐趣。然而，更频繁更好的高潮并没有自动壮大女人的力量，到了70年代中期，很明显的，性解放和更大的性满足本身并没有为女性创造更强大的权力，甚至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如果这些性解放与性满足独立于更基本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之外发生，它们当然无法壮大女人——事实上，许多男人（也许是很虚假地）时常宣称他们支持的就是这样的妇女解放，而媒体则动作迅速地描绘并显然为「新」女性更强的性自主和身体快感背书。

革命女性主义者也尝试避免其他的矛盾——毕竟，有些女人还是想要改进她们和男人的性关系，但同时也想对抗男性对女性嚣张骇人的敌

65 Ibid., p. 8.

66 Ibid., p. 67.

意与暴力——然而，革命女性主义者只想借着将所有异性恋性欲都化约成「男性暴力」来消弭这个矛盾。她们一方面很正确地重新检讨了「女人追求对自身性欲的控制」的观念，也指出把这方面的追求等同于削弱男性的权力和特权，是一种错误的性政治；可是另一方面她们还多走远了一些，她们批评所有的性学家及受其影响的人有着蓄意且成功的阴谋，借着性来逼使女性臣服，以此削弱并颠覆女性主义者的宏愿。

革命女性主义者后来在 1984 年出版的《性欲论文集》(*The Sexuality Papers*)中为过去的一百年提供了一个历史描绘，认为这个世纪从 Havelock Ellis 到 Kinsey 到 Masters 和 Johnson 等等性学家都削弱了女性为追求平等所做的努力⁶⁷，也认为性改革、强调婚内女性性愉悦以及女性追求平等之间都有着「反向的消长关系」。不过，除了好战女性主义(militant feminism)的消退在时序上和 1920 年代性改革运动的发展有着某种程度的重迭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支持革命女性主义的中心论点——她们认为，是性解放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女性主义的愿景受到牵制（不论鼓吹性解放的人有着什么公然的或隐藏的动机）。事实上，这里有另外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1920 年代 Eleanor Rathbone 以及其他人所领导的福利女性主义(welfare feminism)的成长（也就是成功的以「母性天赋」运动来改进妇女的母职及居家生活），导致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衰落。不过，本来就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足以推动或解释这样的历史转变。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也极可能相信）Masters 与 Johnson 的性治疗以及她们创办性治疗的原始目的就是借由在两性之间铸造出以愉悦为本的凝聚力，以巩固异性恋情欲及婚姻（也就是男性宰制）；那么我们必须说，他们真是失败得一蹋糊涂。在大家以为这些性治疗者努力奋斗保存婚姻的 20 年中，英国的离婚率攀升了四倍，在美国甚至更高。⁶⁸ 因此我觉得有可能——而道德右派可能也会同意——至少在女人一旦有了一些独立的经济能力时，她们（经常在婚姻中受到挫折的）对性愉悦的期

⁶⁷ Lal Covney et al, *The Sexuality Papers*, op. Cit., p. 49, London, Hutchinson, 1985.

⁶⁸ See Lesley Rimmer, *Families in London*, Study Commission on the Family, 1981.

望，比较可能会威胁而非稳定婚姻的和谐。

象征的和真实的

然而，革命女性主义的想法对许多女性主义者仍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和女性性经验的其他层面相连，而这些层面是性解放早期的行为主义派应许完全忽略了的。革命女性主义的想法强调，在象征领域中的东西（主流的社会想像以及性语言）有力量可以形塑我们在性上面的思想、欲望、和经验——（「插入的动作绝对无法避免其功能及象征权力。」）⁶⁹但是，在那些普及大众的象征（把所有主动的性都当成男性的以及侵略性的）以及我们个别的性经验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交互作用；环绕着性经验的愉悦、痛苦、欲望和压迫的个人历史，形塑了我们对性的感知，同时大众的象征符号和意义也形塑了我们的经验。我们当然有可能从女性主义思想中获得别种意义，但是同时也可能从别处取得各种影像，这些影像可能包括强悍的、性自主的女人以及温柔而体贴的男人。

然而，权力与屈从的概念确实被建构在有关异性恋邂逅的语言及影像中，这是事实——虽然不是唯一的事实。性幻想和性经验也充斥着权力的色情化(eroticisation of power)，这也是事实。但是，符号、幻想、经验、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是盘根错节的（我将在讨论色情刊物时回到这个主题），而且毫不意外的会让许多女性主义者心乱不安。例如，受虐的幻想是女人性兴奋很普遍的来源（它也是男人性兴奋很普遍的来源。）⁷⁰女人把向男人的臣服加以色情化，成为性幻想，这在女性主义追求平等的目标看来，确实是蛮令人悲痛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把性欲视为个人认同的核心以及社会变动的关键，那就更令人难过了。

一个女性主义者要如何一方面处理渴望被男人驾驭的性幻想，一方面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中处理对抗男性权力的日常抗争呢？革命女性主义的计画看来是个非常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消除个中矛盾的方法：如果

⁶⁹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op.cit., p. 7.

⁷⁰ Nancy Friday, *Men in Love: Men's Sexual Fantasies*, London: Arrow Books, 1980; Shere Hite,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London, MacDonald, 1981.

异性恋的接触真的是一种性暴力，那么女性主义者自己的「变态」受虐性幻想似乎可以解释成是女人学会应付男人的强制性欲 (coercive sexuality) 的唯一方式。这么说来，这些受虐的性幻想是被强加在女人身上的，有点像那些在战场上被炸弹吓坏了的士兵的恶梦，他们不断的在幻想中重历战争的经验，以帮助自己在未来可以应付这些经验。

Justine Jones 在革命女性主义文选《女人反对针对女人的暴力》(*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中主张，女人从很年轻时就被影响变成受虐狂，以便让我们变成异性恋而且享受这个转变⁷¹。写到她对自己的受虐性幻想的「忿恨」，她选择和它们断绝关系，把它们当成与她自我定义的性欲无关：「我憎恨这些受虐幻想，并且努力相信我并不孤独也非变态。」⁷² 她必须和这些幻想划清界线，因为她仍然相信，「被我们自我定义的情欲波动可以从根挑战男性情欲」(她本人的强调)。⁷³

很显然的，我们不可能靠着揭露自身的受虐性幻想，就能从根挑战父权。不管男人或性学家施展过什么样的强制和制约，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女人在和男人做爱时就是能得到欢愉。相反的，强暴则绝不是愉悦的——不管男人或女人对强暴有着何种性幻想，女人绝不会混淆幻想与现实中的区别。女人(或男人)在包含宰制与屈从的受虐幻想中经验到性兴奋，和实际的强暴经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然而革命女性主义的论点却必须坚决主张「性幻想和现实有直接关联」。照这样推想，如果有些女人会因为强暴的性幻想而兴奋，那么她们就必然也会享受强暴的经验——至少有一点点享受。这实在是个危险的荒唐想法：如果女人的受虐性幻想会扩散在日常生活中，造成她们向男人屈服，那么为什么在无数文件中详载的男性受虐性幻想却没有同样的功效？男性和女性的

⁷¹ Justine Jones, 'Why I Liked Screwing or Is Heterosexual Enjoyment Based on Sexual Violence?' in (eds) D. Rhodes and S. McNeill, *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 57,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85.

⁷² Ibid.

⁷³ Ibid.

性幻想并不是简单的反映了男性宰制和憎恨女人的现实（虽然性幻想会受到这个现实的影响）；这些性幻想还得力于我们婴儿时期所有各种形式的性憧憬(*infantile sexual wishes*)——不管是主动的或被动的，爱慕的与憎恨的——这些性憧憬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们孩童时期最早的欲望和愉悦的感觉。

在革命女性主义中，如同在女性主义有关性的大部分写作中，都存在着一个尚未解决的张力：「性」到底是什么？革命女性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明确而一再的拒斥性学的本质主义及生物决定论（「男性情欲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决定的」），然而她们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却回到一个本质的「男性性需求」说法——现在被定义为「男性对权力的需求」。她们认为，男性性欲的行使，创造并决定了男性的权力，而「需要在性活动中宰制对方并行使权力」就决定了男性情欲的本质。⁷⁴ 至于男人为什么需要控制女人，革命女性主义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也没有说明男人如何能——除了透过性活动——成功的控制女人。难道没有比阴茎更结实的武器吗？不管用何种方式，也不管周遭出现了多少相反的论证，我们都好像都被这套理论逼着必须将男性社会权力的复杂历史构成抛在脑后——也被迫忽略这个社会权力是如何将象征权力授与阴茎以作为男性最根本的特征——结果我们被迫回到一个赤裸裸的巨大性能力，而这个能力可以而且也已经被用来控制女人。在描述那钢铁般阴茎的无情力量时，那个被用力推出前门的生理因素，却从后门趾高气昂自信满满地进来了。

革命女性主义在 1970 年代末期声势益增，也强化了女性主义中本质主义思想的复返。她们再度肯定一种非历史(*ahistorical*)的性欲观念，认为性是存在于特定社会脉络或关系之外的；在这方面，革命女性主义和她们极力反对的性学家、医学「专家」和色情人士非常相似。当然，她们也强化了男性和女性基本对立的性本质，巩固了那种最不辩证、最二元的思考：「男性」vs.「女性」、「主动」vs.「被动」、「权力」vs.「臣

⁷⁴ Lal Coveney et al, op. cit., p. 14.

服」。讽刺的是，到了 1980 年代中期，革命女性主义发现必须将她们的注意力从巡逻监控异性恋，移转到巡逻监控女同性恋认同上，尤其是女同性恋的玩虐恋 (lesbian sadomasochism)。革命女性主义者指控那些在性虐待幻想中找到欢愉的女同性恋者是「内化了『男性』价值观」，而更需要受到指责的则是那些喜欢在两相情愿的性行为中扮演这种悦虐角色的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人一样，有些女同性恋者现在也被中伤，说她们拒绝改变、或压抑、或缄默不谈她们的性幻想和性行为，就是支持男性的权力及男性对女性的暴力。⁷⁵

然而，如果我们采纳一个我觉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性欲」分析，就会发现，以上这一整套有关女人天性纯真的繁复宣告，或者必须否认或压抑我们自己的性经验，说它们是「虚假」或「变态」——这些做法实在都是不必要的。这个比较完备的性分析不会认为在女人的（或男人的）认同核心有着什么单一的、毫无矛盾的性本质，也不会把性当作自我表达的关键或社会变化的必要线索。不过，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挑战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假设之一，这可真是致命的一击。

革命女性主义者在写作中把所有和男性的性接触都当作有害女性，可是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如实反映黑人女性、劳工女性、和移民女性的现实。这些女性在社会上更常常是无力而脆弱易伤的，这意味着她们才承受了最多的男性性剥削之苦，而她们的反抗也是最奋力的。另外，革命女性主义对性的理论分析也没有提到西方对性的概念不只是性别歧视的，而且在本质上就是种族歧视的。例如在西方有关性的神话中，代表男性性欲的「野兽」同时也是「黑暗之兽」，是「黑色的野兽」。白种男人与女人把自己对性的罪恶与恐惧，投射到黑色人种身上，制造了黑男人是超级种马、黑女人是淫猥浪荡的神话。历史上，同样是针对白种女人的性犯罪，黑种男人一直比白种男人遭到更严厉的惩罚；直到今日，他们仍然比较容易被错误的以强暴罪名起诉，而过去在美国及其他地

⁷⁵ See Susan Ardill and Sue O'Sullivan, 'Upsetting an Applecart: Difference, Desire and Lesbian Sadomasochism', *Feminist Review* 23, 1986.

方，黑种男人只要稍微向白种女人表示性的亲近，就有可能被私刑吊死。在另一方面，白种男人则可以任意掠夺黑种女人的身体而不受责罚；就像黑人女作家 Angela Davis 于 1981 年写的：「被白男人有系统的施虐和强暴的黑种女人，以及被种族歧视滥用的强暴控诉所残害或谋杀的黑种男人，她们之间有着一种历史的紧密连结，而这个连结直到此刻才刚刚开始被人承认」。⁷⁶ 大约从 1983 年开始，黑人女性主义以及有关种族的辩论终于抑制了——但并没有解决——革命女性主义和政治女同性恋主义在女性主义团体和刊物中进行的激烈辩论。

女性主义对强暴的解释

革命女性主义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在女性主义圈子之外，因为它在分析中把对女人的强暴和暴力，呈现为男性维系普遍宰制时的必要措施；她们认为，不论个人是否强制或暴力，所有的男人都倚赖这样的实践。这个分析方式如今也常常被呈现为女性主义对强暴和男性暴力的唯一解释，1975 年北美激进女性主义者 Susan Brownmiller 以《非吾辈所愿》(*Against Our Will*) 一书使得这个分析首度广大流行，后来则由 Andrea Dworkin 进一步发展并衍申，Dworkin 甚至断然宣称：男性权力「确实是由阴茎而来的。」⁷⁷

然而，这种对强暴的解释忽略了有些社会从来没有人控诉强暴，而且它对一般权力关系的分析也很奇怪⁷⁸。因为，虽然掌权的团体确实会用暴力做为受到叛乱威胁时的最后手段，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宰制的日常生活实践通常不是用赤裸裸的身体暴力来进行的，这在所有社会层面上都是如此，性领域中也是如此。⁷⁹（事实上，使用身体暴力通常是相对弱势的人的行为。）而且，如果性强制(sexual coercion)真的是男性权

⁷⁶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p. 173,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⁷⁷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op. cit.

⁷⁸ Peggy Reeves Sanday, 'The Sociological Context of Rape: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37, no. 4, 1980.

⁷⁹ Steve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力特有的终极工具，那么我们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女人没有早早就发展出体力和装备来「缴械」强暴者？——除非我们假设女人是既盲目又愚蠢的（革命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解释说，女人是被弄瞎和弄笨的）。在我看来，男性的权力并不能被化约为对女人的直接性强制，而要想解决强暴的问题，首要的就是迎战那个霸权的神话，这个神话认为男性需要性宣泄、需要侵略及宰制，因而产生了强暴这个必然产物。

对强暴的恐惧当然是限制女性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往往使我们（至少在公共场合中）保持性被动、矫柔做作、并迁就男人。不过，不管是个别或集体，男人也确实会强暴女人以提升他们「男性气概」的感受，亦即掌权的感觉。我在下一章还会提出，强暴事实上表达了诸多「需求」：愤怒、力不从心、罪恶感、或者对女人的恐惧，这些都和男性尝试肯定他们的「男性气概」有关。在我们这个社会，强暴的盛行以及它造成的问题有一部份就源自于「男性气概」和异性恋操演之间的文化关联；同性恋解放运动已经指出，对「娘娘腔」男性气概的压迫和揶揄，特别是对「偏差」性认同（例如男同性恋）的巡逻监控，就和强暴的现象紧密相连。强暴在我们社会的盛行还有另外一个来源：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实践在创造男人宰制女人的权力时，往往容许男人在性上面虐待女人而享有相对的免责权。

在对抗强暴的威吓时，女性主义者不应该背书「男人必然会有冲动要宰制女人」的说法，而应该挑战我们社会建构并容忍强制性欲(*coercive sexuality*)作为「男性」的特质。我们需要无情的揭露并谴责那些有关强暴的司法和通俗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强暴的前提总是女性先有了主动性欲的迹象，这就构成证据，足以证明是受害者而非强暴者「有罪」⁸⁰。直到今日我们还可以在大部分强暴审判中看到这种假设，英国虽然面对了「割喉之狼」的残暴，警方、媒体、和检察官都还是部份的同意「割喉之狼」Peter Sutcliffe 对惩罚妓女有着某种病态的偏执（即使没有背书他的策略）——因此只有那些最「端庄」的受害人才被描述为「无辜」。

⁸⁰ Delia Dumaesq, 'Rape—Sexuality in the Law', *mf* 5, 6, 1981.

我们也需要严厉谴责，男人在家中对付女人时使用的「私人」暴力往往受到社会的容忍，因而通常没有受到惩罚。相较之下，要是在职场中使用类似的暴力对付同事，即使只是一般能容忍的轻微职场性骚扰，也会立刻去职。

同样的，我们还需要严厉的批评大众文化，因为在那里强暴和男性暴力总是被煽情化、渲染化、并呈现为性挑逗。在所有强暴的案件中，暴力都是最主要的动机，而（除了革命女性主义者和大众对此的过度关切之外）阴茎的插入经常并没有发生。1986年4月Clare Short对〈邱吉尔电检法案〉提起修正案，这个努力虽然被人嘲笑而且后来也没有成功，但是已经达成了它的教育策略功能，因为她尝试阻止通俗媒体一贯把强暴报导和半裸的女性图片并陈于第三版的做法。媒体对强暴案的报导通常把「性」，而非暴力，当成主要因素；这种扭曲掩盖了强暴背后那些报复的、恐惧的、自觉不足的、烦躁的动机。可是类似的批评也可以用来描述某些女性主义的强暴分析，如同bell hooks观察到的：「通常女性主义运动份子谈到男性如何恶待女性时，都好像把它当成一种特权的行使，而不把它当成一种道德破产、疯狂、非人化的表现。」⁸¹

因此，在面对强暴的盛行时，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女性活跃性欲的新定义和新形象，这些应该是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拥有而不至招来暴力相向的。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努力建构新的男性情欲形像，它不但可能是阳刚的、自信的，也可能是被动、柔顺、散漫、和性感的，在其中表达出各种欢愉、慷慨，以及扭曲的、邪恶的感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的挑战「异性恋歧视主义」(heterosexism)各种主导的、狂妄的形式——不管是立法的、社会的、或人际的——因为它们面对那些落于「正常」定义之外的所有人口时，都会透过剥夺后者的社会权利并容忍针对后者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来协助维持一个严谨强制的男性形象以及一个臣服的女性形象。不过以上我说的这些工作的真正重要性，既不在于建立「男人要维持他控制女人的权力，其唯一或甚至首要的方法就是强暴」的说

⁸¹ bell hooks, op. cit., p. 75.

法，也不是说「强暴的主要解释就是男人集体权力的维系」。

色情书刊和男性权力

1980年代女性主义的激进／革命支派之所以转向聚焦于色情，很可能一部份原因是因为，把强暴呈现为男性权力的根本肇因，这个说法有其内在的问题。对这些女性主义者来说，男人恐吓并宰制女人，并不只是透过实际的强暴作为（尽管它的盛行使人惊心动魄，强暴总是一个费事而有风险的举动）；男人也每时每刻用色情包围女人，让她们知道在男人眼中，女人只不过是承接男人憎恨的东西。Andrea Dworkin 是这样描述色情刊物的目的及效果的：「女人的性被挪用，她的身体被占有，她遭人使用，她被人蔑视——这就是色情刊物做的事，而色情刊物的内容也证实如此。」⁸² Dworkin 告诉我们，「阴茎」做为一个「恐怖的象征」，「甚至比枪、刀、炸弹、拳头等等更为重要。」⁸³ 她在她那本讨论色情刊物的恐怖专书中结论说，女人「将会知道，当色情刊物不复存在时，她们就自由了。」⁸⁴

在 Dworkin 的分析中，色情不但教导女人她们的位置就是妓女，也无处不在的持续宣传，驱使窝囊乏味的男性对女人进行益加严重的暴力举动，更同时把女人吓得以为没有任何抗拒的可能性。Robin Morgan 首创一个很出名的说法：「色情是理论，强暴是实践」，自此之后无数女性主义涂鸦艺术家也都宣称同样的想法。这个陈词是简洁有力的。聚焦于色情刊物，很容易就赢得大众支持，而且不论男人、女人、左派、右派都一样支持；因为色情刊物确实典型的概括了我们文化在女性身体图像方面最令人不安和沮丧的部份：女人成了性商品，可用、可弃、永远都可以为男人提供刺激。然而，在我的看来，像 Dworkin 那样认为色情不但描绘了也创造了「男性至高无上权力」的现实，这种看法不但夸大其词，而且是个基本上有缺陷的主张。

⁸²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op. cit., p. 123.

⁸³ *Ibid.*, p. 15.

⁸⁴ *Ibid.*

价值亿万的情色工业在西方繁盛时，正是女人经济独立（当然，还谈不上女人的经济平等）增进的时刻，也就是男人对女人的权力和控制衰退的时刻。例如，不论离婚会带来什么样不利的情况，当时西方女人已经不必继续留在残暴而无情的婚姻中。女人的经济独立和离婚相互关联，由于通常是女人主动提出离婚，这显示是她们为自己做出了决定。现在未婚妈妈已经不必再像 20 年前那样，被排拒在任何有尊严的职业或工作之外，她们也不用再面对无可避免的社会放逐和轻蔑——虽然有时还是可能会遇到；现在女人已经可以而且也真的选择拥有孩子而不要男人，虽然有些女人还是要因此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困境。

有时候我们可以嘲笑（虽然它仍然可能带来威胁）像《每日电报》(*Daily Telegraph*)的 Paul Johnson 那样喧嚣的道德右派对我们的警告，他们说：「单亲家庭是一种社会疾病而且蔓延迅速。」右派很清楚知道，婚姻做为一个提供男人诸多控制女人和小孩的机制，已经逐渐衰落了；在今日极大多数的家庭中，男人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而当他们的经济能力减退时，家庭内在的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结果「上班的」妻子还是要承担双重的的工作负荷，而丈夫们却很少帮助家务。女人生命中的矛盾确实加深了，时代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男人直接宰制女人的权力**并没有**任何清楚的增进。

父权力量在衰落，冲突正在家庭中增加，这也是谘询专栏和其他大众传媒特别鼓励女人在她们的婚姻关系中寻求并期待更多性满足的时刻。从前处女妻子在性事上只能选择做「奴隶」或「性冷感」，现在女人则会——甚至在广播和电视的谘询节目上、在数百万观众之前——评断并揭露男人在性表现上的不力。Mary Louise Ho 最近对专栏作者进行研究后注意到一些已经发生的变化。20 年前像 Mary Grant 这样的传统专栏作家仍在颂扬女人的无私奉献：

如果你把心思从自己的感觉转到丈夫的感觉上，那会对你和

你的婚姻有很好的帮助。让他快乐，永远都不嫌晚。⁸⁵

可是，最近像 Irma Kurtz 这样的专栏作家已经有了不同的观点。她不断地激励女人优先考量她们自己的需求、利益和工作，坚持女人应该有更多自主性：

尽情生气吧！——发脾气、暴怒、想摔东西就摔。让他看到你已经被伤害、被背叛、很害怕也很愤怒。不要害怕会惹他生气，难道他没有惹妳生过气吗？⁸⁶

看起来在每个领域中，男人都不能再稳稳当当的期待女人提供一生的情感支持和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男性之所以增加了对色情刊物的消费，很可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色情为男性衰退的权力提供了一个补偿式的表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色情在那个百业萧条的时刻为资本开拓一个大大有利可图的市场）。因此色情暴露的不是霸权的力量，而是可怜虫的软弱——它反映男人急切需要安稳，至少在幻想中，女人仍然永远可以是男人随心所欲使用和虐待的对象。它是雄鹿做困兽之斗的最后嘶鸣。

Andy Moye 以男性的角度来思考色情的功能和影响，他做出以下结论：

色情运作的方式就是否定男人知道而且害怕成为真实的那个现实。性（对男人来说）不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充满了复杂和焦虑的——性孤立(sexual isolation)、笨拙、「力不从心」、想要「把它做对」时出现的紧张、或者自己觉得不够或不觉得有吸引力。就在这样的焦虑和完美性世界的幻想之间的地带，色情刊物获得了它的力量……。⁸⁷

⁸⁵ Mary Louise Ho,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Agony Columns' in (eds) S. Webb and C. Pearson, *Looking Back: Some Papers from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ender and Society'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anchester 1984.

⁸⁶ Ibid.

⁸⁷ Andy Moye, 'Pornography', in *The Sexuality of Men*, 1985, p. 62, London, Pluto Press.

照 Andy Moyer 的说法，色情刊物展现的根本不是男人控制女人的力量，看来反而好像显示了男人的性焦虑和性偏执；它描绘的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具体性控制，而是男人对「阳具失败之黑暗地狱」("the netherworld of phallic failure")所抱持的那种神经质且令人瘫痪的执着⁸⁸。老牌女性主义者 Elizabeth Wilson 这么说：

色情根本不是在颂扬男性权力，有时色情看起来是设计来安抚男人并缓和他们对于性无能的恐惧。当色情当中出现暴力时，它展现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恐惧和憎恶，也是男人对自己的被动性的恐惧和憎恶……有些男人必须以贬低女人来感觉性力充沛，有些男人则需要自己被作贱。大部分男性性欲似乎是强迫而无趣的，它被表演原则困扰，又被深刻感受到的性无能、不力和失败的恐惧所笼罩。⁸⁹

革命女性主义者相信，研究男人「高度怪异」的性幻想和实践应该会帮助我们了解男人如何用他们的性权力来维持对女人的控制。⁹⁰ 相反的，我想说的是，研究男人的（尤其是那些最怪异的）性幻想和执迷，应该会引导我们更深刻的思考：虽然有着（而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态，男人是如何保持对女人的控制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色情不讨人厌或无害；它确实让大部分女人觉得难过，而且它也一直让我觉得难过。它最让我难过的，是因为它总是那么容易的就变成我自己性幻想的一部份。这些幻想并不是来自我和男人的性经验，而是自小就有的；它们似乎在表达我孩童时期的一个迫切而逼人的需求，我好像需要幻想一种我迫切想要拥有的母性情爱：在幻想中，这样的情爱一直以一种强壮、保护和性感拥抱的形式，来修补我自己英勇但充满羞辱的痛苦。我对这些幻想的感觉总是爱恨交织的，我多希望能够把它们当成虚假的外来物而抛弃它们，但是这里的投射实在是太明

⁸⁸ *ibid.*

⁸⁹ Elizabeth Wilson,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 166,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⁹⁰ Lal Coveney et al, *op. cit.*, p. 13.

显了。

不过，现在大部分色情会让我生气并困扰我，并非因为它的煽情引诱（这已不像以前那样让我忧心），而是因为它是那些淹没我们的、充满性别歧视的女性物化和刻板化形象的一部份。它让我生气且困扰我，也是因为它是那么悲惨的见证了我们的社会中的性的真实状态：虽然经历了百年的性学发展，性仍然基本上被大家经验为污秽、禁忌、无理、且错误的。性仍然太经常是绝望、挫败、罪恶、焦虑和忿恨的来源，而非欢愉和满足的来源。这就男人而言尤其是事实，因为主流的男性情欲形象和男性侵略性是如此轻易的熔结在一起，性事上的表现——也许有时也只有这方面的表现——可以用来巩固主体对认同和权力的感觉。

现在的许多女性主义者相信，色情刊物和男性控制女性的权力创造之间——或者至少在色情刊物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之间——一定有某种直接的关联。当然，许多——但不是全部——色情的基本要素就是描绘男人可以轻易得到女人以及女人的臣服；而且色情也确实大多由男人且为男人所准备（不论女人是否也觉得它让人兴奋）；还有小部份色情在女人的热情性臣服、女人的性高潮和死亡之间展现了暧昧的视觉关系。⁹¹ 这似乎加强并容许男人想像女人有被强力驾驭的欲望，或者更糟的，它也容许大家想像在色情化的女性身体和死亡之间有着某种关联。而当我们每天读到某些男人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可怕残害与性谋杀时，这种连结似乎是让我们深刻感觉的。

被设计和收集起来以测试色情刊物与男对女的暴力之间有何关联的心理学研究结果和官方数据却是不明确且矛盾的。Mosher 在 1971 年所做的一连串心理学调查，以及 Jaffe 等人在 1974 年所做的心理学研究，虽然都推测观看「无侵略性」色情刊物的影响会让男人更赞同对女人的性客体化和性剥削，但是后来却发现色情并没有强化男人对女人表达负面的言词评论或无情的态度。⁹² Donnerstein and Barrett 在 1978 年调整了

⁹¹ Rosalind Coward, 'Sexual Violence and Sexuality', *Feminist Review* 11, 1982.

⁹² D. L. Moshe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Pornographic Films', in *Technical Reports of the*

这个研究，他们使用类似的色情材料，但是同时安排实验对象在观看后被扮演研究者线民或「同伙」的一对男女挑衅，结果发现那些刚看过色情刊物的人对这个女人的侵略性比那个男人还低。⁹³ 不过，1980年 Donnerstein 又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这次使用画面上有女性受害者的「侵略性」色情材料，结果发现它确实引导男人对稍后安排来挑衅他们的女人展现较大的侵略行为。⁹⁴ Malamuth 等人在 1980 年研究了色情刊物性暴力对男人的长远影响，发现不同的强暴描绘方式——也就是将受害者呈现为「享受」强暴或被强暴伤害——会在后来别的强暴描述中影响到实验对象面对女性受害者时的态度：那些在影片中看到受害者「享受」强暴的人，都比较不关心后来故事中的伤害后果。⁹⁵

但是，这些行为主义的研究毕竟用处有限。它们采用的是如此被动和反射的人类行为模式，完全没有考量到研究主体对实验情境或刺激材料的主观诠释，也因此终究未能提供给我们任何延伸他们研究结果的可能。

然而，有关色情刊物与女性受暴犯罪率的增加是否有因果关连的数据调查，还有别的方法学上的问题。当色情的定义无可避免的模糊且具争议时，而且当呈报的犯罪率并不能精确反映女性受暴事件的真实情况时，我们根本很难精确的测量这两个变数。尽管如此，正式的调查数据至今仍无法建立两者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1970 年「美国国家色情风化委员会」的调查结论认为，在北美，色情和性犯罪率的变化之间没有一致的关连，而大家以为性犯罪有急剧增加的趋势，结果也并没发生。在英国，一个类似的、成立于 1979 年的「风化与电检委员会」也做出结

Commission of Obscenity and Pornography, vol. 8, Washington D. D., U. S. Government, 1970,

⁹³ E. Donnerstein and G. Barrett, 'The Effects of Erotic Stimuli and Male Aggression towards Fem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⁹⁴ E. Donnerstein, 'Aggression, Erotica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⁹⁵ N. M. Malamuth, 'A Longitudinal Content Analysis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Bestselling Erotic Magazin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80.

论：「一般性侵害案件以及强暴和性伤害案件的上升趋势，其实在性材料广泛可得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而且「比起一般犯罪案件来，一般性侵害案件以及强暴和性伤害案件的增加趋势在近 20 年都比较缓慢。」⁹⁶

然而，心理学研究和数据调查，两者都有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在媒体影响方面的所有缺点。它们关注即时、确实且可量化的媒体消费在改变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而常常发现局限的或前后不一致的效果。但是媒体影像并不是像触发反应的简单开关那样操作，它们的操作总是持续的塑造并重塑主流观念和思想架构。流行的色情影像之所以是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立即的强暴犯——实证研究显示，性侵犯者和观看色情并没有一致的关连——而是因为它是持续建构社会男女两极化形象的一部份力量。这些影像通常肯定女人是供男性消费的被动、恋物化了的客体，它们也否定男性的柔弱、被动和「女性气质」。色情不断并坚定地强化了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它背书了男性对被动的恐惧，也拒斥男性被动，因此无可避免的协助建构了一个恐惧并恶待女性的主流男性气概，也协助建构了一个期待被男人宰制的主流女性气质。因此，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证据显示色情消费本身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有关连，而没有色情的社会比我们的社会常常更倾向父权暴力；然而大部分充斥性别歧视的色情也确实都重复的、仪式性的肯定现存的性别差异观念，并且认定情欲的不正当和恋物本质。另外，虽然女性主义者发现要给色情下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定义是很困难（而且常常不必要）的事，大多数女人显然也都不喜欢色情。

当色情颂扬那些充满性别歧视的女人非人形象时，它是女性主义者合理的攻击目标。但是，我认为这种抗争不应该采取爆炸情趣商店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行动是非常模糊而无焦点的做法。难道真的是那些黑色橡皮颗粒的假阳具在恐吓我们吗？这种适得其反的攻击行动也不应该包括像有些女人为了分析和了解色情电影的内容和吸引力而进行扰乱色情电影放映的举动。以上两种方式都是 1980 年代英国「女性反对针对

⁹⁶ Committee on Obscenity and Film Censorship, November, p. 78, London, HMSQ, 1979

女人的暴力」组织(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AVAW)的女性主义者筹划反对色情时采取的行动,大多数英国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大力支持加强国家对色情的管制,可是有些 WAVAW 的成员确实赞成这种做法。(有一个成员在 1980 年代早期 BBC 国家电视台针对色情的讨论中就公开发表她对 Mary Whitehouse 的支持。)⁹⁷

支持反色情的检查法令有其明显的危险:由于对色情的定义缺乏共识,因此最后总是强化了道德右派的权力,以监督所有看似「偏差」的情欲和所有露骨的性爱呈现。邱吉尔 1986 年「肃清电视」的法案正是如此,虽然他声称关心女性遭受的暴力,但是被他和他的支持者直接点名的目标,却是像 Derek Jarman 的电影 *Sebastiane and Jubilee* 中的同性恋性欲,而不是电视剧 *Starsky and Hutch* 中的暴力。⁹⁸ 美国反色情条款的立法是由 Andrea Dworkin 和 Catherine MacKinnon 起草的(受到 Mary Daly、Robin Morgan 和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支持),而且在印第安那波里市通过(虽然尚未实施)。这个立法将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狠狠地两极化,后来有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到法院去控告这个立法。那些反对这个立法的人反对的是它背后的理论分析,她们认为这个立法强化了有关男女的性歧视迷思;她们也指出,这个立法将女人呈现为不享受性爱、且软弱无助的受害者,而女性主义艺术、色情和女性性谘商都有可能成为被控诉的对象。另外,这项法令也没有直接针对更广泛的性别歧视再现⁹⁹。目前美国司法系统正在决定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项争议结果,这也显示有关色情的辩论和策略变成了何等分裂和破坏的力量。

在我看来,比较适当的女性主义行动方式,不是去要求国家检查色情,而是试着了解、分析和公开讨论色情的吸引力,评论它并有时采取直接行动去消除那些主要为挑逗男性而设计、使用、和恶待女性身体的色情和性歧视形象。(例如在某些工作场所,女性主义者成功地要求把

⁹⁷ Quoted in Joan Smith, 'Mrs. Whitehouse's Private Member', *New Statesman*, 13 December 1985, p. 10.

⁹⁸ Ibid.

⁹⁹ Liz Kelley, 'Feminist vs Feminist', *Trouble and Strife*, Winter 1985.

公开张贴的女性裸体图片月历移走，但她们强调并非露骨的性，而是对女人的性客体化，让她们觉得被冒犯)。我们也必须要求男人自我分析并告诉我们，为何这么多男人喜欢并且「需要」色情刊物，我们要求他们了解为什么大多数色情对大多数女人而言是具有冒犯性的，我们并且要求男人们对此理解采取行动。(例如，1979年有两位来自伯明罕附近劳工部门的男性经理就成功地从他们所有的工作场所移除了女体图片、色情照片和女体月历。) ¹⁰⁰ 但是如果我们的评论要有建设性而且有效干预，我们就需要仔细并批判地来看男性及女性形象的整个光谱、脉络和包装。因为，就如 Rosalind Coward 等人所主张的，令人厌恶的色情符码和意义很显着地出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再现实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色情是一个错误的攻击目标。除非我们通盘的来定义我们讨论性别歧视符码的方式，讨论它们如何操作并生产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为何令人不悦，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被人误解……很奇怪，我们对「性别歧视」、「无礼」和「践踏」等字眼的描述，持续的存在在一种低度开发的状态。¹⁰¹

充满性别歧视的再现，不能被简单的化约为露骨性爱的展现。要是我们把性别歧视化约为最明显的性挑逗，那么由女人为女人所写的罗曼史小说看来似乎可以被女性主义当成和男性色情一样合适的分析、批判、和了解标靶。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同样发现对强壮、有力的阳具男性的坚决崇拜，但是其影响确实可以说是更阴险的，因为它比较不明显。但是性别歧视进驻几乎每一传媒产品的每一形象中，它们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嫌疑。我所说的性别歧视，意思就是女性形象总是被呈现为比男性差劲或低劣，而她们的存在则被呈现为为了挑逗和服务男人。

譬如，奥斯卡奖电影「亲密关系」(Terms of Endearment)中的清新「家庭」娱乐就是彻底的性别歧视，因为它把女人呈现为自私、自恋、幼稚

¹⁰⁰ Tony Eardley, 'Pin-ups Come Down on Building Site', *Achilles Heel* 4, 1980.

¹⁰¹ Rosalind Coward, op. cit. p. 19.

的。其中 Shirley MacLaine 饰演的母亲总是把自己的需求摆在首位，直到最后才被一个男人救赎；由 Debra Winger 饰演、和她做对比的女儿则是无私、柔顺、奉献地为丈夫和小孩而生存。¹⁰² 面对女性主义对主体性和性自由的渴望，这部电影至少和另一部电影 *Dressed to Kill* 一样，都是强大的反挫，但是只有后者会因为把女人展现成男性的受害者而被 WAWAW 唾弃。

如果我们对色情的批判不只是一要反映和否定我们自身对性的焦虑和困惑，那么女性主义者就需要（如同许多女性主义者现在已经开始如此）更宽更广地看看所有的女性再现形式。事实上，我们必须抛弃激进或革命女性主义那种「坚持我们需要拒绝的，但拒绝我们需要坚持的」的立场。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我们有什么内在的性本质，而以为这种性本质在女人身上是健康的，在男人身上则是不健康的。我们必须坚持，女人对性也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我们需要瞭解男人性暴力的普及并不只是简单的内在性驱力的产物，也不是内在的权力驱力的产物——透过拥有阴茎而实现——而是整体男性社会权力的产物。男人主观的性需求虽然是复杂而矛盾的，但无法和所有建构特定侵略性男性气概风格的社会压力分开。

近期已有为数不少关于情欲和欲望的书开始采纳这样的进路¹⁰³。它们主张所有的性实践，不论异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性取向、举动、或风格，都是透过他们从——法律的、家庭的、宗教的、医学的——霸权社会机制中获得的历史意义来中介的。透过这些机制来维系的异性恋体制在我们所有的性观念中创造了狭隘和无趣，但是它并没有阻止女人或男人涉入抗争，去转变异性恋实践中典型

¹⁰² See Ellen Seiter, 'Feminism and Ideology: the Terms of Women's Stereotypes', *Feminist Review* 22, 1986.

¹⁰³ See 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 *Sex and Love: New Thoughts on Old Contradiction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3; Ann Snitow et al (eds) *Desire*, London, Virago, 1984; Carol S. Vance (eds), *Pleasure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 Jegan Paul, 1984; Rosalind Coward,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Paladin, 1984.

呈现的脉络、意义和权力关系，它也没有阻止男女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奋斗以确立多元情欲的正面本质。Barbara Ehrenreich 曾经说过：

我们必须找个方法把同性恋权利带出同性恋贫民区。我希望它不再是一个特别利益。我认为扩展人们的性观念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¹⁰⁴

1980 年代北美与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这个新书写，已经开始聚焦于「欲望」的本质，以及它和权力之间的关连，将其间的连结追溯到婴儿期和我们在对其他人欲望依恋时的愉悦痛苦个人历史，也追溯到周围的脉络和男性宰制的意识形态。这个新观点认为我们的方向应该强调女人寻求和找到的性愉悦是多样的，同时许多男人对女人的暴力也是危险的。这样的观点拒绝把任何一种性爱实践放在其他性爱实践之上，以作为更值得嘉许、更令人满足、更正确的选择。今日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中心奋斗，确实应该是设法削弱此刻正在建构宰制男性和顺服女性、以及异性恋性欲是「自然」正常的意识型态的那些现存机制和社会意义。可是，正如 Jeffrey Weeks 主张的，我们达成这些目的的方式应该是察看并试着去改变性关系的脉络，而不只是简单地专注在性行为本身之上。¹⁰⁵

虽然强暴、色情和男性暴力是女性主义在 1980 年代用来解释女性臣服的一个主要公众声音，然而这是因为——如同 Liz Heron 在 1981 年指出的——女性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妇女运动中不再拥有声音或明确的身分」。¹⁰⁶ 事实上，在英美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之中有着不同于激进和革命女性主义性观点的另类女性主义分析，这些另类观点尝试解释性欲与暴力、性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它们援引的理论框架迥异于我们在本章中所看到的化约主义和生物主义。法国拉冈思想学派在学术女性主义中很有影响，而美国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心理分析思想学派则

¹⁰⁴ Barbara Eherenreich, in *In These Times*, vol. 7, no. 40, 1983.

¹⁰⁵ Jeffrey Weeks, op. cit.

¹⁰⁶ Liz, Heron, 'The Other Face of Feminism', *New Statesman*, April, 1983.

被吸收进入一种比较通俗的女性主义思潮。这些由心理分析引领的理论在解释性别差异时，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呈现了新的问题来让女性主义者尝试理解个人的人生政治。

——选自 Lynne Segal, "Beauty and the Beast I: Sex and Violence," Chapter 3 in her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eminism*, New York: Peter Bedrick Books, 1988. 70-116. 经作者授权翻译。